

1206
104

文学革命终结之后 ——新世纪文学论稿

◎ 孟繁华 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革命终结之后：新世纪文学论稿 / 孟繁华著. --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143-0554-8

I. ①文… II. ①孟…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6 ②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70386 号

文学革命终结之后：新世纪文学论稿

作 者	孟繁华
责任编辑	臧永清 李 鹏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xdcbs.com
电子信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0.25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5-5143-0554-8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新世纪文学”的经典化与当代性 / 001

新世纪文学：文学政治的重建

——文学政治的内部视角与外部想象 / 009

乡土文学传统的当代变迁

——“农村题材”转向“新乡土文学”之后 / 020

新世纪十年：中篇小说论要 / 035

历史、现实与多元现代性

——2009 年长篇小说现场片段 / 050

这就是我们的文学生活

——2009 年中篇小说现场片段 / 061

这个文体还是让人如此着迷

——2010 年中篇小说现场片段 / 079

在不确定性中的坚持与寻找

——2010 年长篇小说现场片段 / 093

2011：长篇小说的青春书写 / 111

批判性与文学精神的重建

——2011 年中篇小说现场片段 / 124

文学革命终结之后

——新世纪中篇小说的“中国经验”与讲述方式 / 140

北京短篇小说 60 年 / 153

民族传统与“文学的世界性”

——以陈季同的《黄衫客传奇》为中心 / 161

谢冕和他的文学时代 / 172

“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叙述

——评陈晓明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 / 183

不确定性中的苍茫叩问

——评曹征路的长篇小说《问苍茫》 / 190

日常生活中的光与影

——新世纪文学中的魏微 / 201

在历史的缝隙中突围

——新世纪文学中的 70 年代作家 / 208

黄河落尽走东海，万里写入襟怀间

——评何建明、程贤章主编的《中国治水史诗》 / 222

“憎恨学派”的“眼球批评”

——关于当下文学评价的辩论 / 235

“心事”二则 / 242

附录

民族心史：中国当代文学 60 年 / 249

后记 / 316

“新世纪文学”的经典化与当代性

“新世纪文学”在不同的议论中悠然走过了十年的历史，十年的历史都发生了什么会有不同的叙事。但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新世纪文学”十年这束时间之光，照亮了我们此前未曾发现或意识到的许多问题，当然也逐渐地照亮了“新世纪文学”十年自身。从最初的对“新世纪文学”这个概念的质疑，逐渐转化为对当下文学、也可以理解为对近些年来文学价值认知的讨论，这是十年时间之光照亮的一部分问题。无论持有怎样的观点，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新世纪文学”十年需要做出价值认知的判断。但目前讨论因各种因素的制约，所达到的水准还不高，还仅仅限于情感态度和立场方面。但是，透过这些表面或感性的表达，其背后隐含的根本性问题，应该是对“新世纪文学”十年的当代性或经典化问题的认识。这既是一个对文学现实的认知问题，也是一个文学观念和批评的理论问题。

关于文学经典化的问题，我曾在不同的场合中表达过，特别是在几次编写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现场讨论中。我认为，文学史的编写，就作品而言，一是要确立文学经典，一是要注意文学史经典。所谓文学经典，就是经过历史化之后、经过时间淘洗经受了时间检验的优秀作品。用弗克马的话来说，文学“经典”是指

一个文化所拥有的我们可以从中进行选择的全部精神宝藏^①；所谓文学史经典，是指在文学发展过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但本身并不具有经典性的作品。如果不讲述这样的作品，文学史的叙述就不能完成。在当代文学领域，就“十七年”而言，它的“经典化”已经初步实现，虽然其间经历过“再解读”，但“三红一创保山青林”（《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保卫延安》、《山乡巨变》、《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被普遍认为是“十七年”带有鲜明社会主义文学特征的文学经典；而《我们夫妇之间》、《达吉和她的父亲》等，只是“文学史经典”。这样的作品虽然不具有经典性，但通过对这些作品的评价，我们才能讲述清楚社会主义初期阶段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文学。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文学是一个“试错”的过程，或者说，刚刚跨进共和国门槛的部分作家、特别是来自“国统区”的作家，并不明确如何书写新的时代，并不了解文学实践条件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因此，在“试错”的过程中，制度化地建构起了文学规约和禁忌。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十七年”时期，文学界有绝对权威话语权的拥有者。比如周扬，他对某部作品肯定或否定，该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或价值的评价就有了基本的依据；比如茅盾，如果没有他对《百合花》的肯定，不仅不能终止对《百合花》的质疑或批评，《百合花》在它的时代究竟是怎样性质的作品，恐怕还是一个问题。除此之外，西方经典文学的尺度和对我们的影响、不同时期的阅读趣味和意识形态要求、不同的文学奖项的颁发、不同的文学选本、一个时期对某些文学倾向的倡导等，都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对文学经典的指认或认同。这样看来，“新时期”30年来文学经典的难以确立，重要的原因就不仅是时间问题，是“历史化”程度不够的问题，同时，也与没有绝对的权威批评家的认定以及上述提到的诸多因素都有程度不同的关系。因此，在各种当代文学史著作中，对30年来文学经典的确认都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一方面这是正确的，一方面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中国文学经典的确立，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并不仅仅是中国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的事情。这个过程并不是线性的按照现代历史发展的逻辑展开的，它的变化的全部复杂性并不完全在我们的想象和实践中。一个突出的例证是夏志清的《中

^① 弗克马·易布思著：《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第5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版。

国现代小说史》，他的许多判断对重写中国百年文学史产生过重要影响。也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作品的评价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张爱玲、沈从文和钱钟书在中国现代文学历史叙述中的地位，与鲁郭茅巴老曹比较起来并不那么重要。但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中国大陆得以传播之后，许多人接受了他的看法。对夏志清的接受不只是抬高了张爱玲、沈从文和钱钟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同时也引发了对现代文学史上主流作家的重新评价。这个现象呈现出的问题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化的过程，已经不是中国文学自己的事情，国际汉学界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介入，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化的进程和格局，它使“经典化”的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一方面，它使现代中国文学逐渐被国际社会所注意，他们的评价带来了国际背景并提供了另一种参照；一方面，文学评价也为另一种意识形态所掌控，带来了文学评价的“对峙”格局。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并不阅读中国当代小说的德国汉学家顾彬在2006年对中国当代文学发表的“垃圾”说。^①这一评价在国内批评界引起了轩然大波。问题不在于顾彬语出惊人的评价，在此之前，国内文学界内外对当代文学的诟病在大小媒体上早已耳熟能详，但批评界充耳不闻坦然处之。问题在于为什么一个外国汉学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负面评价，使文学界难以接受。这件事情使我们联想到20世纪80年代文学界的一个口号：“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这是一个祈使句，在这样的表达中，我们总会感到这是一个文学弱势国家内心的失落或不自信。或者说，中国文学自觉地将自己设定在世界文学的总体版图之外，并表达了能够融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强烈愿望。但是，2010年1月14日，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孔子学院、美国《当代世界文学》杂志社，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召开的一次会议则被命名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在这个陈述句中，“中国”是陈述主体，“向海外传播”既是方向也是意志，它的坚定是不能动摇的。这是“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东方文化向西方输出”的想象在文学上的表达。但是，在这样的表达中我们可以看到，25年间中国和中国文学发生了怎样的变

① 《中国作家、批评家集体反击顾彬》，金羊网2006-12-17。另：2010年1月14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学术研讨会上，作家李洱说，在顾彬和他的交谈中顾彬说，他“从来不看中国当代小说”。一个不读中国当代小说的汉学家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可见其不负责任到了什么程度。

化。虽然我们已经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主体性，但是，通过顾彬“垃圾”说事件表明的是，当代文学的评价和经典化与国际背景有了密不可分的关系。

对现代文学 60 年或近 30 年来文学经典的确认尚且如此，对十年来文学经典指认的困难可想而知。因此，对当下文学或近十年来文学的评价，用我们过去理解的“经典”不可能成为一个尺度。我们更需要面对的是十年来文学的“当代性”问题。这个“当代性”是指文学的总体状况改变了“时间的总体化”逻辑，而且是以一种不确定性和非逻辑化的方式发展运行。许多文学因素以突如其来的方式改变了现代性时间总体化的预设，使本来就扑朔迷离的文学现状变得更加复杂。而恰恰是这种复杂的“整体性”构成了当下文学状况的丰富性和“当代性”特征。那么“新世纪文学”十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者是如何发生的，我以 2009 年长篇和中篇小说的状况为例来展开讨论。一方面，长篇和中篇小说创作出现了许多值得注意和评论的新的趋向和作品，为当代文学提供了新的本土经验；一方面，“当代性”包含了更为广阔和丰富的内容，包括已成为“历史”的文学也在不同力量的支配下，强行进入了当代并构成文学当代性的一部分。

如前所述，夏志清对张爱玲的举荐所产生的影响，在 2009 年并没有成为过去。张爱玲的《小团圆》在 2009 年的出版，不仅是 20 世纪 90 年代“张爱玲热”在 2009 年代不加宣告的延伸和不可忽视的存在的提示，同时也以“事件化”的方式，加剧了“新世纪文学”当代性的复杂性。2009 年 4 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张爱玲的《小团圆》，据悉，首印 30 万册顷刻销售一空。出版宣传指出，“《小团圆》以一贯嘲讽的细腻工笔，刻画出张爱玲最深知的人生素材，在她历史中过往来去的那些辛酸往事现实人物，于此处实现了历史的团圆。那余韵不尽的情感铺陈已臻炉火纯青之境，读来时时有被针扎人心的滋味，故事中男男女女的矛盾挣扎和颠倒迷乱，正映现了我们心底深处诸般复杂的情结。”它的出版，被称为是“全球 3000 万张迷翘首企盼”的事件。于是一时间里“张迷”们奔走相告。《小团圆》将经久不息的“张爱玲热”推向了 2009 年的高潮，并被中国图书评论学会评选为“2009 年十大图书”。张爱玲在大陆的阅读几经起伏，但通过电影《色戒》和《小团圆》之后，可以肯定的是，她的“经典性”被最大化的同时也已经品牌“透支”。因此，在图书出版“策划化”的今天，她强行进入“当代”就远非是一个文学事件。

《废都》的初版距今已经 14 年过去，它无论以哪种形式重新出版，都是一个重要的事件，都会引起读者和文学界极大的兴趣与关注。无论 1993 年前后《废都》遭遇了怎样的批评，贾平凹个人遭遇了怎样的磨难，都不能改变这部作品的重要性。我当年也参与过对《废都》的“讨伐”，后来我在不同的场合表达过当年的批评是有问题的，那种道德化的激愤与文学并没有多少关系。在“人文精神”大讨论的背景下，可能任何一部与道德有关的作品都会被关注。但《废都》的全部丰富性并不只停留在道德的维度上。今天重读《废都》及它的后记，确有百感交集的感慨。在其他场合，包括在文学会议或文学讲座上，我都曾表达过：《废都》一定会重新评价。这个看法，是源于对文化环境的分析和对《废都》的重新认识获得的。如上所述，在 1993 年代——社会大转型的年代，道德化标准还是文学批评的标准之一，《废都》中的性描写的不合时宜是不难想象的。但是，经过十年之后，这部作品的全部丰富性才有可能重新认识。《废都》的重要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作为长篇小说，它在结构上的成就，至今可能也鲜有出其右者。长篇小说是结构的艺术，很多长篇小说写不好，不是作家没有才华、没有技巧和生活，主要是对长篇小说文体的理解有问题，也就是对长篇结构的理解有问题。但《废都》在结构上无论作家是否有意识，都解决得很好；二、小说在思想内容上得风气之先：贾平凹最早感受到了市场经济对人文知识分子意味着什么。可以说，这个阶层自现代中国以来，虽然经历了各种变故，包括他们的信念、立场、心态以及思想方式和情感方式，但从来没有经历过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这个冲击对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来说，实在是太重大了。贾平凹感知了生活变化对他们精神世界的改变，于是才有了庄之蝶。1993 年以来，长篇小说我们能记住几个人物？但我们都记住了庄之蝶。更重要的是贾平凹对庄之蝶的态度，我们不能说贾平凹对他的主人公是欣赏的，他只是用小说的方式呈现了他。庄之蝶最后的命运说明了贾平凹的态度。在那个时代，迷惑、困顿的不只是贾平凹，我们都不是先知，都在困惑和迷惘中。也正是这个困惑迷惘成就了作家的创作，却使批评陷入了迷途。《废都》的重新出版只是提供了我们重新阅读和评价这部作品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庄之蝶心态”在今天知识阶层的普遍性，我们可能会体会得更为充分，它提供了知识阶层精神当代性的一个范本。

当然，新世纪文学更值得关注的是本土经验的积累。在现代性的时间总体化

逻辑中，“新”是一个重要指标，“新”不仅清楚地标示了时间的变化，而且在理论上容易概括和掌握。但是进入新世纪之后，文学的变化除网络文学这个新媒体催发的文学形式之外，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变化的步伐越来越缓慢。文学形式革命虽然仍有可能性，但经过 80 年代旋转木马式的追新浪潮，形式革命已疲惫不堪。因此文学的变化呈现的是渐进性而非激进式的，这种缓慢的变化不易被粗糙的批评所察觉。而有些批评甚至连认真考察的愿望都没有。我仍以 2009 年的小说创作为例。长篇小说如宗璞的《西征记》、苏童的《河岸》、阿来的《格萨尔王传》、高建群的《大平原》、方方的《水在时间之下》、张翎的《金山》等都受到了普遍的好评。但就文学的当代性而言，可供谈论的可能还是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和曹征路的《问苍茫》。一个写历史，一个写当下。刘震云写历史并没有写“大历史”，没有执行“史传传统”的路线，甚至历史的背景都相当模糊。他书写的是两代人与“说话”的关系，说话是小说的核心内容。我们每天实践、亲历和不断延续的最平常的行为，被刘震云演绎成惊心动魄的将近百年的难解之谜。历史叙事大多是国家民族或是家族叙事，历史在这里是一个依托：没有历史就不能展开叙事。但在刘震云这里，“祛历史化”表现在这只是一个关于个人内心秘密的历史延宕，只是一个关于人和人说话的体认。对“说话”如此历尽百年地坚韧追寻，在小说史上还没有第二人。无论是杨百顺出走延津寻女，还是牛爱国奔赴延津，都与“说话”有关。“说话”是一种交流，但更是一种“承认”。夫妻之间的关系，除了生理需要、传宗接代之外，“说话”就是最重要的形式。但老高和吴香香私通前说了什么话，吴摩西一辈子也没想出来；章楚红要告诉牛爱国的那句话最后我们也不知道，曹青娥临死也没说出要说的话。没说出的话，才是“一句顶一万句”的话。当然，那话即便说出来了，也不会是惊天动地的话。在小说中一定要这样表达，只是小说的技法而已，这和《红楼梦》中的黛玉临死也没说出宝玉如何、《废都》中有许多空格没有什么区别。需要破译的恰恰是已经说出的话，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说话”如何形成政治的。这些普通人是 中国最边缘或底层的群体，在葛兰西的意义上他们是“属下”，在斯皮瓦克的意义上他们是“贱民”，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是没有话语权利的阶层。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说被排除在历史叙事之外，是刘震云发现了这个群体“说话”的历史和隐含其间的伦理、智慧、品性等，最根本的是，说话就是他们的日子，他们最终

要寻找的还是那个能说上话的人。刘震云虽然写的是历史，但他是通过当代发现了历史，发现了人性的普遍性。人与人内心真正的隔膜是被当代人更深刻地体悟和发现的。

反映当代生活并以文学的方式参与当下公共事务的作品，最有影响的作品应该是曹征路的《问苍茫》。多年来，曹征路站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地带，密切关注着 30 年来中国大地上发生的这场改变国家民族命运的社会大变革。他的作品不是那种花团锦簇、莺歌燕舞式的时代装饰物，也不是貌似揭露、实际迎合的所谓“官场文学”。他陆续发表的《那儿》、《霓虹》、《豆选事件》以及长篇小说《问苍茫》等，在以“现场”的方式表现社会生活激变的同时，更以极端化的姿态或典型化的方法，发现了变革中存在、延续、放大乃至激化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曹征路承继了百年来“社会问题小说”的传统、特别是劳工问题的传统。不同的是，现代文学中包括劳工问题在内的“社会问题小说”，是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背景下展开实践的，它既是五四时代启蒙主义思潮的需要，也是启蒙主义必然的结果。在那个时代，“劳工神圣”是不二的法则，劳工利益是启蒙者或现代知识分子坚决维护或捍卫的根本利益。但是，到了曹征路的时代，事情所发生的变化大概所有人都始料不及，尽管“人民创造历史”、“工人阶级”、“社会公平”、“人民利益”、“劳动法”、“工会”等概念还在使用，但它们大多已经成为一个诡秘的存在。在现代性的全部复杂性和不确定中，这个诡秘的存在也被遮蔽得越来越深，以至于很难再去识别它的本来面目或真面目。无数个原本自明的概念和问题，在忽然间变得迷蒙暧昧甚至倒错。于是，便有了这个“天问”般的迷惘困惑又大义凛然的《问苍茫》。

我还想指出的是，新世纪以来文学成就最大的是中篇小说，这是一个不大引人注意的文体。它的整体成就我在其他场合论述过。在 2009 年的中篇小说创作中，我尤其需要谈到晓航的《断桥记》。^①这是一部发生在城乡连接处的小镇的故事。小镇在中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小桥流水、青石小路、淑女雅士、贞节牌坊……都是中国文化的奇观。既有静谧的传统生活，又与都市一箭之遥，文化深厚又不事张扬。文学中的鲁镇、乌镇、天迥镇，都是如此。《断桥记》中的落玉

① 晓航：《关于〈断桥记〉》，中国作家网 2009 年 10 月 16 日。

川虽然历史不长，但它的小镇属性与悠久历史的小镇并没有区别。但在这里上演的故事却意味深长让人歆歆不已。在《断桥记》中，传统就是诗意。不仅落玉川的自然地貌一山一水，被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人亦如此。落玉川的缔造者龙秋泉和他的女儿龙姗姗被描绘出的形象就是想象的传统符号。“现代”文明虽然也文质彬彬温文尔雅，但这个文明的背后似乎总与阴谋联系在一起。我更感兴趣的是晓航在这个纯属虚构的故事里，对传统与现代的态度。

新世纪以来，包括乡土文学、女性文学、都市文学甚至“官场小说”，都不同程度地提供了本土经验，甚至它们不那么成功的经验，一起构成了新世纪文学的当代性。无论是成功或不成功，都不应是对新世纪文学简单的价值判断，而应该是我们讨论问题的起点：这些作品或现象为什么会是这样。因此，在文学的当代性正在发生或生成过程的时候，在它还没有经过历史化或经典化过程的时候，轻率地否定新世纪文学的价值，就不仅是不恰当，而是不负责任的一种行为。当然，在我为新世纪文学做出辩护的时候，我并不是认为它不存在问题，没有问题的文学时代是不存在的。但是，这需要在整体肯定新世纪文学价值的基础上来讨论。

2010年1月18日于北京寓所

新世纪文学：文学政治的重建

——文学政治的内部视角与外部想象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文学与政治的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关系被终结之后，这个关系已经不再被注意。这里大概有两个潜在的心理因素在起作用：一是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式里，文学充满了挫败感和惨痛记忆，文学的依附性或奴婢身份使文学一直卑微和没有尊严地存活。这个历史成为过去之后，没有人愿意再触及这曾有的伤痛；二是这似乎已经是一个自明性的关系，文学是一个自由、独立的领域。“祛政治”，甚至“消灭政治”就不仅是文学家的幻觉，他们更愿意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实践条件。但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并没有因此而解除，并没有因这两种心理因素的暗示而不存在。真实的情况是，近年来不仅有学者呼吁建立“文学政治学”^①，而且海外学者和国内的“知识左翼”，一直没有停止关于文化政治、文学政治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文学作品中的政治，从来就没有退场。尽管“个人写作”、“解构宏大叙事”等口号和实践改写了中国文学的路向，但这种“祛政治”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我这里所说的“文学政治”不是文学研究和批评中隐含的政治。比如臧棣的《“诗意”的文学政治》，他认为：

^① 苏州大学教授刘峰杰，曾发表多篇关于“文学政治学”的文章。

对于新诗的历史而言,“诗意”既是一个令人困惑的神话,又是一个无所不在的幽灵。说一首新诗“饶有诗意”或“富于诗意”,虽然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赞扬,却也可能隐含着更深层次的不满;其批评的潜台词甚至可能是矛盾的,一方面,它可能是对这首新诗在内容方面显露出的古典气质的称赞,但放到整个新诗的语境中去衡量的话,也仅仅是个特例。更普遍的情形则可能是“诗意”的匮乏。另一方面,它也可能被如是看待:这首诗在技巧上或许还说得过去,但缺少足够真正的创意,这种创意的核心内容是回应新诗所应具有的现代性。……我的主要目的是梳理“诗意”作为一种话语是如何呈现于新诗的实践过程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究竟有哪些诗学势力参与了“诗意”在新诗中的话语运作,并考察它们在特定的语境中所包含的文学政治的意蕴。^①

臧棣发现了“诗意”是以古典诗歌的标准来评价新诗的,这里隐含着“文学政治”,这是对新诗评价中两种立场借助“诗意”展开的斗争,背后隐含着对新诗褒贬的认同关系;我所说的“文学政治”,也不是“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②我所说的文学政治,是指文学同政治公开或隐秘的对话、表达和阐释,是在作品中直接表达对政治的看法。新世纪以来,乡土文学、“官场小说”、“底层写作”、历史小说、海外华文文学等,都与政治有扯不清的瓜葛。这种现象的实质是:

种种实质性的不平等无论如何都不会从世界和国家里消失;它们只会转

① 臧棣:2006年11月在东京举行的由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九叶读诗会、驹泽大学主办的“中国现代诗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宣读的论文。

② 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林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

移到另一个领域里去。它们可能脱离政治领域而在经济领域集结起来，但它们之所以离开，是因为它们现在在另一个领域获得了新的、远远更富于决定性的重要性。在表面的、肤浅的政治平等的条件下，当一个领域里的实质性不平等占了上风（例如今天的经济领域），这个领域就将取得对政治的支配权，这是不可避免的。任何对政治理论的反思都会看到，当今经济学支配国家和政治这个可悲的、受人诟病的现实，其背后真正的原因正在于此。无论在什么地方，不平等概念都作为一个连带性概念制约着平等概念，而一旦对具体差别漠不关心的平等概念摆脱了这种制约，并在事实上控制了某个人类生活领域，这个领域就失去了它的实质性，另一个体现着不平等的无情力量的领域，就会把它笼罩在自己的阴影中。^①

本文要谈论的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对 20 世纪中国革命历史的叙述与检讨，当这场革命终结之后我们如何评价它，因此我将其称为“内部视角”；一部是讲述海外华人为捍卫个人权利和尊严的斗争，因此我将其称为“外部想象”。无论是内外，它们的共同特征就是鲜明的政治性。

无产阶级革命在 20 世纪的发生和终结，应该是这个世纪最重要的文化遗产。如何评价、检讨这场革命，也应该是文学创作最重要的资源之一。我们当然也有很多表达这场革命的作品甚至是经典作品，比如“三红一创保山青林”等。但这些作品还不是我们所说的对革命进行评价和检讨的作品。这些作品还只是从外部强调或证明某一时期革命的合理性或合法性，并没有走进革命内部去分析革命以及革命文化带来的深刻影响。而正面书写被革命修辞、革命文化遮蔽的革命内部的隐秘，当代文学创作还不曾表达过。过去我们曾读过类似的作品，比如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等。这些作品曾给过我们以巨大的震动：这些作家对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态度，与那些耳熟能详的革命文化是如此的不同。遗憾的是，我们很少有作家对 20 世纪中国革命做正面强攻式

① 转引自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8 月版，第 341~342 页。

的书写。在这个意义上，艾伟的《风和日丽》的出现是我们期待已久的。这显然是一部大作品，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去解读。但更重要的是艾伟对革命历史多有同情的理解。他用文学的方式揭开了革命内部的隐秘，同时用理性的方式处理了对革命历史的态度。

主人公杨小翼是一个“革命”的私生女。这个身份与革命构成了一种“吊诡”关系：一方面她身上流淌着革命者的血液，是革命者的后代；一方面她的身份不具有合法性，因此她是一个“革命弃儿”。虽然革命是风流、浪漫的孪生兄弟，革命文学也多在浪漫主义范畴内展开。但革命的感召力本身具有鲜明的道德色彩，一切与“私”有关的事物都是与革命格格不入的：“私情”、“私通”、“私人”、“私仇”、“私心”、“私利”更不要说“私生子”了。“私”是革命的禁忌，是被严格排斥在革命话语和道德之外的。因此，杨小翼只因革命家尹桂泽和“革命情人”杨沪的一夜风流而出生，实属偶然和意外。革命具有强烈的流动性，它天上人间居无定所风驰电掣。尹桂泽从此没了消息，他只对革命负责而不对“私”的领域负责。问题是杨小翼作为“私”的产物总要有人对她负责，她也有权利知道自己的来处。于是，革命内部的隐秘就这样在一个他者的寻觅中逐渐呈现出来。

革命的风流气质决定了革命家的风流。将军的合法妻子周楠是在延安时组织安排的，因此将军以及所有人对“革命情人”杨沪以及在法国里昂留学时的法兰西姑娘守口如瓶讳莫如深。革命家的风流史是不能言说的，这不仅关系到将军个人的命运前程，更重要的是与革命禁忌构成的尖锐对立，与革命信仰以及革命教义是不相容的。如果谈到，那也是“年轻时代的一件荒唐事而已”。将军的情感世界不会向任何人打开，但他并不是一个没有情感的人，只是将个人的感情掩藏在最深处而已。他可以不见杨沪、多次拒绝杨小翼，但当外孙伍天安被警察带走后，是他亲自出面把天安接走了；当天安在逃亡路上意外车祸死不见尸时，是将军找到了外孙的尸体并安葬在香山旁的墓地。这些细节是在紧要处、同时也是在险要处表达了将军作为人的情感和伦理。

小说以杨小翼的经历和视角展开，这个视角使小说充满了私秘性。神秘的个人身世是杨小翼内心焦虑、紧张的根源，身份探询既坚韧不拔又举步维艰。寻找的过程也是杨小翼经历社会、与社会以及血缘逐步建立关系的过程。将军、尹南